

关于功能理论、社会系统理论及 社会变动问题的再思考

〔日〕富永健一

一、社会学是否存在“理论危机”？

社会学在其短短不足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中，至少已经过了三次发展高峰。第一个高峰在十九世纪，即社会学的草创时期，掀起这个高峰的一方是圣西门、孔德、穆勒、斯宾塞等英国和法国社会学的创始者，另一方是斯坦因、马克思等德国社会学的创始者。第二个高峰为1890年代至1920年代，即由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开创了社会学的繁荣时期的人们所兴起的，他们是欧洲社会学“五巨匠”滕尼斯、迪尔凯姆、齐美尔、韦伯、帕累托以及大约在同一时代为美国社会学的独立发展奠定了基础的G·H·米德与库利等人。第三个高峰是在第二次世界

代化模式进行比较研究的时期，我国却陷入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内耗之中，在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上都出现了长期的徘徊、停顿，损失了宝贵的光阴，错过了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对话的宝贵时机。社会学被打入冷宫近三十年，足以反映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实施现代化发展战略，并把改革与开放作为这一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短短几年中，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以人们始料不及的速度发展，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方面出现的急剧变化以及随之引起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讨论，已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大大激发了中国学术界的思考。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向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大量急待探索的问题。

我国社会学界及整个社会科学界，对当代发展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可说是刚刚起步，研究力量之不足，成果之微薄，是与实际的需要极不适应的，也是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的。然而，令人兴奋鼓舞的是，目前，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已有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有了自由讨论的条件，这正是我国的发展研究有可能后来居上、取得成就的希望所在。今天，中国学者正以自己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民族自尊心和时代紧迫感，带着充分的勇气和决心去探索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真理，并将以自己独特的见解、崭新的理论对世界发展研究作出应有的贡献。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社会变革正处于关键时期，伟大的改革实践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理论诞生的现实环境。中国学者将与世界各国富于批评精神的进步学者合作，去促进发展理论的真正革新，以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在去年的本刊创刊号上我们发表了陈一筠《浅谈国外发展研究》一文。本期我们又刊登了富永健一和冯钢的两篇有关论文，我们希望将这方面的研讨开展下去。

大战以后，尤其以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为中心，当时社会学正处于世界规模的发展时期，其主要代表有首次将美国社会学提高到世界水平的帕森斯、默顿、霍曼斯、戴维斯、穆尔以及由欧洲移居到美国的舒茨、拉扎尔斯基、本迪克斯，还有同时代率领欧洲社会学前进的阿隆、柯尼希、舍尔斯基、霍克海默、阿多诺等等。现在，第三个高峰的旗手们大都已谢世或已到暮年，而第四个高峰尚未到来，其旗手还未完全确定，正处在青黄不接的过渡时期。

卢曼曾用“理论的危机”来表示社会学现在的这个过渡时期。他认为，有一道门槛挡在社会学的面前阻碍着它的发展，并且因无法明察其前途而变得更加复杂。要摆脱这种状态，社会学就必须努力创造不同于过去的新型理论，但是，社会学自身又不具有形成这种新型理论的因素。于是，卢曼便到那种对于社会学来说是外在的、然而却是跨学科的理论中去寻找这种模式。自我参照、自我指示的系统理论的方法就属于此列。卢曼指出，从开放性系统理论（即系统-环境的分析图式）向自我参照和自我指示系统理论的转变，是近年来值得注意的一般系统理论在范式上的革新。社会学中的社会系统理论，应该效仿一般系统理论的这种范式革新。^①

那么，卢曼所作的社会学现在正面临“理论危机”的诊断是否准确呢？社会学发展的第三个高峰，使社会学的“理论”获得了多元化发展。在美国，这种多样性由功能主义、符号互动主义、交换理论、冲突理论、本土方法论等构成；而在欧洲，除了上述之外，结构主义、批判的理性主义、交往行为理论等在社会学内外都具有广泛的影响。由于这些理论中的无论哪一种理论都未能同时代所有社会学家所接受，因此均不符合库恩意义上的“范式”，不过，它们至少形成了社会学第三个发展高峰中的丰富多彩的“诸潮流”^②。绝望地将这种丰富的多样性称之为“危机”，显然是不恰当的。如果要用危机这个词来描述社会学的现状，那只能用它来表示在各个发展阶段的过渡时期所出现的混乱。如上所述，在社会学第三个高峰中扮演主角的人们不是已经作古就是已到垂暮之年，但是社会学的第四个高峰是个什么样子，尚未见端倪。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学目前的确处在一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如果只用危机这个词来解释过渡时期中的混乱，卢曼关于社会学正面临危机的诊断还是可以接受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卢曼的另一个诊断，即现在的社会学缺乏创造新的理论模式的因素，所以只能在社会学之外（卢曼是在一般系统理论中）寻求这种理论模式是否正确。卢曼认为，系统概念的形成经过了整体对局部、系统对环境 and 自我参照这三个阶段，而现在的一般系统理论的范式的变换，则是从系统对环境的范式到自我参照系统的范式的过渡。在卢曼看来，社会学不仅被排斥在这种范式变革之外，并且由于缺乏基础理论的准备而甚至无法理解所发生的是什么变化。因此，卢曼指出，社会学必须汲取一般系统理论的这种范式变革，这正是摆脱社会学理论危机的一条途径。^③

卢曼的主张虽然不乏出色的论点，但也存在若干问题。这里我想指出如下几点。第一，系统概念的发展除了卢曼所指出的三个阶段以外，恐怕还应包括因要素的相互依存而造成的原因与结果无限循环的（但却是递衰的）影响这个定式化阶段。也就是说，因各人强调的重点不同，迄今为止人们至少提出了四种系统概念：（1）整体对局部；（2）要素的相互依存（通过原因和结果的相互影响而趋于平衡）；（3）系统对环境（超越边界的输入与输

① 《Soziale Systeme》，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Niklas, 1984: PP 7-14.

② 参见富永健一《现代的社会科学家》，日本讲谈社1984年版。

③ 同前书，第15-29页。

出)；(4)自我参照系统(具有自我评价作用的系统)。第二，这四种概念的关系并不是相互排斥，而是同时并存、相互结合的。换言之，这些概念不象卢曼所想象的那样，后来出现的概念会因范式的变革而抛弃前面的概念。第三，自我参照系统或自我指示理论能否有效地解释社会系统中的各种现象，尚属未知之事，直到今天，还没有任何事实表明：这种理论是可信的。与此相反，从社会学的产生到现代，其他三种系统概念却与社会学理论本身难以分割地结合在一起。

我与卢曼的观点不同，我不认为一般系统理论应在社会学理论中发挥主导作用。如果社会学理论使用一般系统理论是有益的，那么也可以利用这种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因为社会学理论自身没有固有的基础理论准备，所以要依靠一般系统理论。过去，社会学在构筑社会系统理论时所以要从一般系统理论和控制论中汲取一定的概念，就是因为社会学理论中存在功能理论这一固有的基础理论，把它与系统概念结合起来是有益的。如果说社会学今天正陷入理论的危机，那么，要克服这种危机，就必须重新探讨功能主义本身并使其得到发展，而不是突然去依靠“不知是否会对社会学有益”的一般系统理论。

二、关于功能理论含义的再探讨

首先，我们要注意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对于社会学来说，系统理论是从自然科学中的一般系统理论中借来的东西，而功能理论则是十九世纪以斯宾塞及迪尔凯姆为代表的宏观社会学以来使社会学理论获得固有发展的说明性理论。对于宏观社会学来说，功能分析所具有的意义可与均衡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意义相媲美。自瓦尔拉和马歇尔以后，均衡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派中已有一百年的历史；同样，自斯宾塞和迪尔凯姆以后，功能理论在宏观社会学中也已经拥有一百年的历史了——社会学家首先应该正确认识这一学说史的事实。

亚历山大总结了六十年代以来围绕功能主义批判所进行的一系列争论。如他所述，以美国为中心进行的许多争论，一直是将功能主义批判特殊化为帕森斯批判。毋庸赘言，在功能主义成为第三个高峰的中心理论的过程中，帕森斯理论确实起到了主导作用。但是，这并不能直接得出下述结论：因为指出了帕森斯理论的缺陷，所以便可以抛弃整个功能主义理论。**从社会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到第三个高峰，功能主义理论一直在宏观社会学中占据中心的地位，它决不只是第三个高峰的产物，也不仅仅是美国社会学的产物。**我们必须看到，过去，帕森斯只是在整个世界社会学发展舞台上登场的一个人物。在很多场合，美国社会学界对帕森斯的批判，只是从自己身边的美国社会的文化状况来看帕森斯，而没有充分注意到功能主义理论对宏观社会学发展的深刻意义和长远影响。

功能主义在社会学中的这个漫长的时间跨度，与作为自然主义方法的实证主义的科学理论的演进是同步的。孔德的社会有机体概念就是如此。隔着多佛尔海峡，孔德的实证主义与穆勒的经验哲学方法——归纳逻辑学发生了共鸣，孔德的实证主义通过穆勒传到了英国，并由此孕育了斯宾塞的自然主义的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理论。最早提出结构功能理论原型的是斯宾塞，他把结构概念和功能概念理解为互相对应的两个基本的表示社会学分析层次的概念，并把进化的方向性理解为结构层次上的社会异质性的增大(即结构分化)和在功能层次上的各部分间的相互依赖性的加强。

重新渡过多佛尔海峡，将由孔德开始、经穆勒和斯宾塞发展的实证主义的社会理论带回

法国的是迪尔凯姆。迪尔凯姆一方面把穆勒的归纳法作为分析数据的方法接受下来，同时又将斯宾塞的社会进化法则定型为分工论，并按照斯宾塞的方法从结构层次和功能层次两方面进行了考察。在结构层次上考察的是环节型社会和有机型社会，在功能层次上考察的是机械的联带和有机的联带。

无论是斯宾塞还是迪尔凯姆，都将结构的概念与功能的概念密切结合起来。在斯宾塞那里，两者的结合来自有机体类比。也就是说，他认为，高等动物诸器官功能的分化，是基于作为实体的有机体的结构分化的，这种关系同样也适用于发达产业社会的结构分化与功能分化。迪尔凯姆虽然慎重地控制使用斯宾塞那种公然的有机体类比，但是仍然使用解剖学与生理学的类比，认为社会也和有机体一样，结构的学问与功能的学问是互相对应的。如果把这些有机体类比看作潜在的系统概念，那么可以说，**无论是斯宾塞还是迪尔凯姆，都默认了社会系统与有机体系统的同型性这种假设，在这种假设中存在着对系统、结构和功能的三位一体的认识。**

通过继承了迪尔凯姆思想的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努力，这个三位一体由潜在形变态变为显在形态。拉德克利夫-布朗把亲族看做社会系统，并把亲族系统的结构看做婚姻习惯那样的社会关系的制度形态，认为亲族系统的功能即是其结构所发挥的满足需要的作用。将拉德克利夫-布朗对未开化社会所做的分析应用到现代产业社会的，是帕森斯对社会系统所做的结构功能分析。不言而喻，人们对未开化社会所做的结构功能分析集中在对亲族的分析上，而关于现代产业社会的结构功能分析则需要对复杂的群体、组织、社区和阶层结构进行多方面的分析。

可以说，社会系统的需要这个概念在作为社会宏观理论的社会系统理论中的意义，与行为者的功能这个概念作为社会微观理论的行为理论中的意义是一样的。当维持有机体生存的个体需要得不到满足时，个体就会死亡；当维持种族生存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时，种族社会就会灭绝；当人类所必须的社会、文化的需要不能满足时，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人就会出现人格缺陷。运用这种类比，在功能要件得不到满足的时候，社会系统可能还会出现列维所说的消亡或系统秩序不完整的情况。但是，列维所说的消亡概念，只适用于局部社会（如核心家庭或企业），而不适于整体社会（如日本社会）。这是社会系统与有机体系统截然不同之处。与有机体系统不同，社会系统的结构是可以改变的。在功能要件得不到满足的时候，社会系统不会消亡，而能够通过现行结构的改造以使功能需要得到满足。例如，西方诸国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演进到近代市民社会，实现了结构变动；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从德川幕藩体制演进到明治专制制度，也实现了结构变动。换言之，**社会系统的功能要件的满足，与其说是社会系统存续的条件，不如说是社会系统结构的存续条件。**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整体社会，也适用于局部社会。可以说，**社会系统正是为了提高自己满足功能要素的能力，才具有了创造新结构、抛弃现行结构的自我组织化能力。**

如上所述，尽管功能理论或结构功能理论是在帕森斯和默顿以后才赋与了现在这样的名称，但是这种思想方法的历史却与社会学的历史一样古老。与此相反，控制论及一般系统理论在社会学中的历史却要比功能理论短得多。控制论和一般系统理论在社会学之外获得了成功以后，其影响才在六十年代波及到社会学，这时，社会学从十九世纪以来形成的功能理论的传统，也与控制论和一般系统理论相独立，达到了一定的发展水平。当时还出现了巴克利的尝试，他不满意社会学理论的这种状态，企图将一般系统理论直接纳入社会学理论中。但是，控制论和一般系统理论毕竟是自然科学中的概念，将它们过于直接地引进社会学理论便会发生问题。**控制论是关于机械系统的控制机制的理论，一般系统理论是关于生物有机体系**

统的自我组织化机制的理论，而功能理论或结构功能理论则是关于社会系统的结构形成与结构变动的理论。如果机械系统、有机体系统和社会系统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同型性，那么控制论和一般系统理论是可以适用于社会学理论的。但是，**由于这三个系统并不具有同型性，所以，社会学理论不能过分依赖控制论和一般系统理论。**从这个观点出发，我想对近年来社会系统理论的发展做若干评论。

第一点评论是针对斯通普卡的。斯通普卡认为社会学中的功能理论是一般系统理论的一部分，并把它解释为系统分析的特殊形态。这种解释是否合适？的确，控制论和一般系统理论均具有超越其固有的经验的对象的说明力。也就是说，控制论超越自动控制机械的控制机制，对于生物现象中的内环境稳定那样的保持恒常性的机制也具有一定的说明力。同样，一般系统理论不仅能够说明生物有机体的自我组织化机制，而且对于社会现象中的环境适应机制也具有一定的说明力。但是，如果认为控制论完全可以解释机械现象和生物有机体现象，那么要说明有机体个体的发展和种的进化这种由一种状态向另一种较为复杂的状态进化的自我组织化过程，恐怕就超出了控制论的能力。同样，如果认为一般系统理论完全可以解释生物有机体和社会这两方面的现象，那么要说明古代专制过渡到中世纪封建制或中世纪封建制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这种伴随着行为主体的有意识变革的系统结构的变化，一般系统理论恐怕也难以胜任了。重要的是，机械系统、有机体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有一种复杂的等级关系。因此，**关于较为复杂的社会系统的理论的功能理论不可能是关于较为简单的有机体系统的理论的一般系统理论的一部分。**

第二点评论是针对卢曼的。上面所讲到的在社会系统的功能要件得不到满足时，社会系统会消亡或发生结构变动这一事实表明，结构功能理论是说明社会系统怎样才会发生结构变动的理论。达伦多夫认为，均衡理论所表现的社会系统概念近似于整合理论，所以无法说明社会变动，他对结构功能分析的这种不幸的误解对人们的影响很大。卢曼则认为，由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把结构放在功能之前，所以丧失了研究结构变动问题的可能性，并且成为为现状合法化服务的理论。我认为，卢曼关于结构功能理论性质的理解继承了达伦多夫的误解。以这种错误的理解为前提，卢曼建议改变结构与功能的顺序，将功能放在结构之前，使结构功能分析变成“功能结构分析”。在卢曼看来，功能结构分析与结构功能分析不同，它是研究结构现状的合理性并解释结构变动的理论。但是，卢曼的这个建议完全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由于结构功能理论这个名称中结构一词在先，所以就意味着以结构为先决条件、以功能为次要条件，从而使结构的现状合法化。名称中的结构一词无论在先还是居后，一开始就对理论的实质没有任何影响。我认为，结构功能理论这个名称意味着：将结构与功能结合起来，并从功能的角度来说明结构为什么处于A状态而不是B状态，或者结构为什么会从A变成B这样的问题。例如，职业结构中的前工业阶段、工业阶段和后工业阶段的不同，可以用各个阶段对职业结构要求的功能的不同来加以解释。在这个例子中，结构与功能相互依存，谁在先谁在后都无妨大局。简单地说，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和功能结构主义理论，恐怕是意义相同的理论。

三、关于社会系统概念的再探讨

首先研究一下第一节所列举的四个系统概念。其中的第一个概念指的是将无法还原为局

部的整体概念化为系统。在社会学的第一代，这个整体概念是用社会有机体这个词来表现的。孔德与斯宾塞特别是斯宾塞的有机体概念成了系统概念的代用词。实际上，斯宾塞在维持系统、限制系统和分配系统这三层结构中，已将有机体表现为系统。值得注意的是，斯宾塞在这里是从自然主义观点来理解整体概念的。生物学的类比（有机体论）和物理学的类比（机械论）是自然主义的两个主要来源，在这两种自然主义中，物理学的类比就象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理论那样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结合在一起，而不是与整体概念结合在一起。孔德和斯宾塞所以选择生物学的类比，是因为他们一方面坚持作为科学方法论的实证主义，另一方面又打算构筑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不同的社会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有机体论成了比较合适的方法论基础。尽管迪尔凯姆没有象斯宾塞那样公开使用有机体类比，但是由于他接受了孔德和斯宾塞型的自然主义的整体概念，所以他的理论也近似有机体论的系统模式。

目的论的说明是有机体论系统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例如，对于人的心脏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构（被说明项）这个问题，它可能会解释说，这是因为这样最容易达到将血液送往全身的目的（说明项）。对并非人有目的地创造的假设一个目的，很容易走上反科学的歧途，即在自然过程中找出一个神或拟人化的意志。但是如果换一种思维方式，用结构与功能的相互适应来解释这个问题，就不会出现反科学的情况。关于社会系统结构的问题也是如此，譬如，对于农业社会中的家庭和亲族组织为什么会是父系家长制结构这个问题，或者对于现代产业社会中的家庭为什么多采取核心家庭的结构这个问题（被说明项），我们可以解释说，这是因为父系家长制家庭及核心家庭在农业社会及现代产业社会中分别适应了家庭功能的需要（说明项）。这种解释与斯通普卡区别于“简单功能分析”而提出的“定向功能分析”是对应关系。

四个系统概念中的第二个概念是关于要素的相互依存关系的概念。这个概念由来自于与有机体论不同的机械论模式（这是自然主义的另一个源流）。在社会学的第一代学者中尚未出现这个概念，即使在社会学的第二代学者中，也只有帕累托使用了这个概念。帕累托赞成孔德倡导实证主义，排斥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做法，但又认为孔德和斯宾塞的实证主义不是真正的实证主义，建议将它重新构筑成逻辑-实验的科学的方法论。帕累托倡导逻辑实验主义要比维也纳学派倡导逻辑实证主义早十五年，但二者事实上是同样的东西。这就是说，帕累托的科学方法论与卡尔纳普和诺伊拉特的方法论一样，均来自物理主义。不过，帕累托不是直接从物理学获得这种方法论的，而是从他自身所研究的新古典经济学中获得这种方法论的。

帕累托的社会系统是由表现四组变量的相互关系的联立微分方程式体系所定义的，这四组变量是（1）残基（residue）、（2）派生体（derivation）、（3）社会的异质性（social heterogeneity）与循环（circulation）、（4）效应（opphelimity）。这里的相互依存的意思即：原因变量与结果变量无法分离，任何一个变量所发生的变化都是其他变量变化的原因，变化的效应无限大。值得注意的是，帕累托的这个社会系统概念是应用物理主义的自然主义定式社会现象的典型，但是又与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不同，包含了一些关于主观“精神”状态的变量。也就是说，帕累托的特有概念——残基、派生体、效应，均与支配人的行为的主观感情有关。令人感兴趣的是，帕累托使用这些关于主观精神状态的变量的事实表明，在分析社会现象时，不仅需要宏观的系统分析，而且需要微观的行为理论作为分析的基础。

第三个系统概念是根据系统-环境术语创造的概念。按照这个概念,所谓社会系统,就是一方面被环境所包围,同时又与环境保持差异的境界维持系统。在这种场合,系统与环境之间的输入和输出互相交换,以适应环境变化的需要。这个系统概念的特点是,它一方面具有整合第一个系统概念(有机体系统)和第二个系统概念(机械系统)的性质,另一方面又包含前两个系统概念所不具有的系统与环境之间的输入输出互相交换这个概念(即开放系统概念)。我们必须承认,这两个特点均受到控制论和一般系统理论的影响。控制论和一般系统理论的贡献在于,在信息输出的系统控制功能中寻求有机体系统和机械系统的共同功能,以整合地把握有机体系统和机械系统。

创造这第三个系统概念的主要是社会学第三代学者中的核心人物帕森斯。帕森斯为了批判地重新构筑亨德森所解释的帕累托的系统概念,才想到了机械系统与有机体系统的同型性,他的系统概念比控制论和一般系统理论出现得早。当然,后来控制论和一般系统理论出现时,帕森斯也在某种程度上吸收了这些理论的观点。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的原型不同于控制论和一般系统理论,所以具有控制论和一般系统理论所没有的社会学的独特方法论。所谓帕森斯社会系统理论的社会学的独特方法论,就是把社会系统分析的方法看作结构功能分析。帕森斯在《系统理论目前在社会学中的地位与展望》这篇方法论论文中,最早阐述了他的这个观点。他说,过去人们一直把解析力学的微分方程体系这种纯粹的动力学分析看作高速发展的科学的某种理想,在这里,构成系统的所有变量都是互相依存和同时决定的。但是,这种分析方法并不能原封不动地成为所有科学的模式,社会系统分析需要采取与此不同的观点。例如,在帕累托提出的社会系统模型的各种变量中,社会异质性与循环是系统的结构要素,用解析力学的方法根本无法处理这些变量。社会系统与物理系统的不同点之一是,社会系统多拥有结构范畴,因此不同于在过程和相互依存中逐渐解体的物理系统,它必须拥有结构这个概念。

重视控制论和一般系统理论中所没有的结构范畴,是结构功能理论的特点。在社会系统中,无论是群体、组织或社区,其行为都与一定的结构连结在一起。在社会系统的内部(系统本身)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本质的重要差异,这种差异靠境界维持。为了使这个境界继续维持下去,系统必须通过自己调整自己的内部状态来适应境界外部的变化。系统为了维持系统的境界而进行的必要的活动就是功能,但是系统的功能要以系统具有与功能相适应的结构为前提。譬如,在封建社会的结构中不可能进行资本主义的活动,要进行资本主义活动就必须具有与之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的制度结构。因此,当环境需要进行资本主义活动时,如果系统的结构适应不了这种变化就必须对其进行改造。这就是“自我调整系统内部状态”的意义。必须承认,达伦多夫、卢曼和巴克利所以过于重视动态分析,并拒绝使用或极度轻视结构概念,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结构范畴在社会系统分析中的重要性。社会结构本身的确属于静态的范畴,但是在社会系统中,变动的动态过程只有结构变动,所以,要分析变动,就必须使用结构范畴,这一点恐怕是不难理解的。

第四个系统概念是一般系统理论中最近出现的关于自我参照系统的概念。卢曼认为应该将这个系统作为社会系统理论引进社会学中。卢曼认为,在自我参照性这个概念中,要素、过程、系统的特点是均作为自生的单位。所谓自生,意即与他者的观察判断无关。因为从外部无法观察一个单位的内发作用。在系统-环境理论中,观察者能够认识系统与环境的差异,与此相反,在自我参照系统理论中,这个差异是通过系统本身的自省作用来认识的。在这个

意义上，自我参照系统是个封闭系统。

自我参照系统的概念是在生物学中形成的。社会学家注重的是，将这个概念引进社会学后将会获得什么样的理论成果，但是直到今天还很难确定它在社会系统分析中的作用与地位。将自我参照系统理论引进社会学时，最核心的问题是它在多大程度上考虑了有机体系统中所没有的社会系统的固有特点，能在多大程度上与这个意义上的在社会学内部发展起来的社会学的固有理论结合起来。结构功能理论依赖内环境稳定、控制论、一般系统理论等自然科学的理论成果，但并不仅仅是对自然科学成果的模仿，而是将它与斯宾塞、迪尔凯姆以来已具有一个世纪历史的社会学的固有理论传统结合起来。尤其是结构范畴的引进以及它与功能分析概念在理论上的结合，已经不是对自然科学成果的模仿。将自我参照系统理论引进社会学时，需要研究的是它与自斯宾塞、迪尔凯姆起，经马利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到帕森斯和默顿的结构功能理论传统的关系问题。它是否定结构功能分析，还是继承并改造结构功能分析？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它要继承哪一点、改造哪一点呢？

卢曼认为，从系统-环境理论到自我参照系统理论的发展，是库恩意义上的“范式革命”。但是，从社会学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并不认为自我参照系统理论可以取代系统-环境理论。即使不提自然科学的问题，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理论是否适用于社会学的历史也是疑问颇多的。我认为，社会学历史的特点毋宁说是在于没有“范式”的多元理论构架的同时并存及其主流的“逐步发展”。

回顾一下我上面所列举的社会学史的三个发展高峰，在其发展的主流中，掀起了第二个高峰的人们并没有否定第一个高峰的遗产，而是将其继承并加以发展。关于这一点我举了迪尔凯姆和帕累托的例子。属于第二个高峰的五位“巨匠”中的其余三人均是德国社会学会的创始人，德国社会学与英国社会学和法国社会学不同，它脱离了启蒙主义的传统，但是滕尼斯、齐美尔和韦伯关于现代化、社会分化以及合理化发展的理论，依然继承了孔德和斯宾塞以来的进化理论。作为第三个高峰的主角的帕森斯和默顿，继承了迪尔凯姆的功能主义、帕累托的社会系统理论和滕尼斯、齐美尔与韦伯关于现代化、社会分化、合理化的理论，以及韦伯的行动理论，并且认为这些理论具有较高的科学水平。

由此不难看出，在帕森斯去世后的今天，展望社会学的第四个发展高峰，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应该研究些什么课题。我认为，这就是继承在第三个高峰中所形成的但未完成的功能理论与社会系统理论，并把这种研究看作自第一个高峰起、经第二个高峰而到第三个高峰的整个社会学发展的继续，通过认真推敲，使这些理论成为较高层次的社会学理论。下面，我想通过论述社会变动的理论这个主题对此做一些尝试。

四、功能理论、社会系统理论与社会变动问题。

机械一经制造，便会有生锈或发生故障的现象，但不会出现结构变动。有机体个体除了生长和老化以外，也不会变成其他结构。但是社会系统则不然，家庭会由父系家长制家庭演变为核心家庭，企业会由集权制变成分权制，君主制会变成共和制，封建制会变成资本主义。结构功能理论认为，这些结构变动并不是没有方向的，而是朝着更适应于环境的变化方向变动。结构功能理论用社会系统中的结构的功能来说明结构形成，又在研究结构功能的同时用结构所不能发挥的功能来说明作为结构形成相反方面的结构变动。

把太古以来的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就会发现，在技术经济发展方面，它经历了狩猎采集社会、园耕社会、农业社会和产业社会各个阶段；在社会文化发展方面，它经历了原始社会、古代社会、高等中间社会、近代社会等阶段（帕森斯语）。我们可以把这些发展阶段看作社会系统满足功能需要的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要达到个人无法实现的满足欲望的水准，社会就要有目的地组织化。从微观的角度来看，这个过程是满足欲望的过程；从宏观的角度来说，这个过程则是功能要件得到满足的过程。个人行为者的欲望，是社会系统的功能的微观基础，因此，构成社会系统的各个行为者希望欲望得到更大满足的动机，可以说是致使满足功能要件的能力不断提高的动力。换言之，长期以来人类为了提高自己的欲望水平而要求社会系统拥有更高的满足功能需要的能力的动机，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因。这可以说是社会发展的内因。在一个社会内部产生的发明、发现、创造、革新以及支持和促进这些事物的行为，都是这种内因的一个方面。

但是，众所周知，人类并没有一同实现社会发展，发展出现了快、慢和停滞的差异，并因此分化为发达国家、后发展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原因何在？就在于内因力量强弱程度不同。也就是说，在发达国家，内因的力量很强；在后发展国家，内因形成得较晚；在不发达国家，内因的力量很弱。后发展国家及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依赖于发达国家的文化传播。一个社会通过传播接受了外部的发明、发现、创造和革新等等，并因此而实现了社会的发展的情况，可称之为依靠外因的发展。由于后发展国家及不发达国家的内因形成得晚且弱，要实现发展，就只有依靠外因。

十九世纪末始自欧洲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现代化理论，是按照依靠内因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现代产业社会的变迁的西方社会的历史经验来解释这种变迁的。现代化理论在把非西方后发展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同时，往往又历数西方社会所具有的各种内因，认为这是非西方后发展国家所缺乏的因素，并以此作为这些国家未能获得发展的原因。我们可以把这种理论叫做“缺欠理论”。众所周知的韦伯的“只有西方”的命题，就是缺欠理论的古典模式。而结构功能理论则为这些现代化理论提供了分析工具。

现代产业社会在西方的诞生，包含下述五个要素：（1）绝对君主制的解体与近代国民国家的形成；（2）市民革命即脱离君主专制和土地贵族的解体；（3）科学革命即近代科学的确立；（4）启蒙主义即摆脱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束缚；（5）产业革命即现代工业生产的开拓。而脱离西方中世纪秩序的要求，则是这五个要素的共同主题。在同一时期（十六至十八世纪）的中国、日本等非西方世界，却没有一个国家出现了旨在摆脱传统社会的内发的要求。因此，正如“缺欠理论”所说的那样，这种内发的发展“只有在西方”才能进行。当然，如果把西方社会分解为若干社会，那么就象格申克龙所讲的那样，法国比英国“落后”，德国比法国“落后”。这样一来，真正实现了内生的产业化与现代化的就只有英国了。但是，英国、法国、德国曾作为日耳曼世界共同经历过西方中世纪，因此均有脱离中世纪秩序的要求，美利坚合众国则是在这个延长线上形成的新世界。

象西方这样仅靠内因实现了向产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变动的例子，恐怕可以用自我组织系统或自我参照系统来加以说明。在这种场合，我们可以用自我组织化的承担者阶层这个概念来代表那些对封建社会解体和近代市民社会的组织化做出了贡献的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家及启蒙主义思想家。但是，“只有西方”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产业化和现代化这一历史事实是否表明：并不是所有社会均具有实现社会发展的自我组织能力？缺欠理论要说明的正是

这一点。在缺欠理论看来,非西方社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完全是不可能的。韦伯是这样看,威特福格尔也是这样认为。然而,十九世纪后半叶以后,由于俄国、东欧和日本走上了产业化的道路,现代产业社会开始突破西方的范围。日本通过第二次大战以后的高速经济增长,完全成为现代产业社会的一员,南朝鲜和台湾也紧步日本的后尘加入了这个行列,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也开始实行真正的现代化政策。这些国家的变化都不能说是依靠内因实现社会变动的,因此无法用自我参照系统理论来加以解释。那么,怎样才能用功能理论和系统理论的观点来解释非西方社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呢?

日本与中国一样,曾在传统社会中创造了高度的精神文化,在它们中断了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往来及文化交流时,发展陷于停滞,并与在此期间完成了现代化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西方社会拉开了距离。直到十九世纪西方列强开始采取帝国主义政策以后,日本和中国才发现自己很难适应新的国际环境,两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引进西方文化,试图通过西方化来实现改革。

促使日本进行革新的动机,主要来自对幕府、诸藩的财政困难及国防危机的认识。文化传播本来对任何后发展社会都是开放的,其中的日本所以会最早成功地实现了产业化和现代化,就是因为日本国内要求改革的动机很强。这种动机产生于国民对国家危机的认识。无法解决这些危机的幕府体制在政治上的合法性,受到了横井小楠和佐久间象山等人的攻击。但是,在幕府末期,传统主义在日本仍占绝对优势,试图引进西方思想的横井和佐久间成了恐怖分子的牺牲品。明治维新的主导思想——尊王攘夷的内容,实际上是以古代专制的天皇制取代幕藩体制。明治政府通过采取这种表面形式避免了与传统主义的冲突,同时推进了现代化的进程。

中国1911年的辛亥革命,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晚了半个世纪,但是从它是实现了共和制的革命这一点来说,要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更富于革新气息。不过,日本的明治维新成了产业化与现代化的出发点,而中国的辛亥革命未能成为这种出发点,对其原因的分析超出了拙文的范围,这里仅想指出如下三点。第一,日本的明治政府是统一的、讲求实效的政府,从大久保利通到伊藤博文的主要领导一贯推行殖产兴业政策,促进了日本的产业化与现代化的发展。与此相反,在中华民国,袁世凯死后统一政府也随之消失,军阀割据,内部纷争愈演愈烈,象段祺瑞、张作霖这样的军阀头目从未想过要推进中国社会的产业化与现代化。与他们相对抗的领导人孙文虽然具有很高的西方教养,但他的思想主观社会主义的成分很大(他的三民主义之一的民生主义的主观主义色彩最浓),因此对资本主义的产业化持否定态度。第二,1890年以后,日本已在民众阶层形成了由企业家、技术人员、白领职员、熟练工人等组成的产业化队伍,而中国从清末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经辛亥革命到孙文的三民主义,中国的现代化思想一直只是知识分子的运动,脱离民众的倾向很强。这是因为民众这时还继续生活在传统的家庭、亲族和村社中,不关心国家的经济与政治,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思想和运动成为与人民大众无缘的东西。第三,在德川时代,日本的农业生产力和农村工业的发展就已达到一定的水平,虽不充分但却为产业化做了准备;而中国当时由于土地集中和人口过剩,农民极度贫困,未能为产业化做出任何准备。

非西方社会在进行产业化和现代化时碰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传统阵营与现代阵营的对垒,在外生的发展中很容易出现这类问题。在非西方社会通过文化传播输入产业文明时,对于非西方社会的人们来说,这种产业文明当然只能是外来文明。这就很容易使人们对产业文明产生一种来自民族主义情绪的反感。明治政府最初成功地回避了这个问题,但是在昭和

初期（1926年以后），由于农民生活的贫困化，这个问题重又发生。当时造成农民生活贫困化的原因是：（1）明治维新以后，由于土地集中到寄生地主手里，佃农的比率迅速提高；（2）这些地主向农民索取很高的地租；（3）二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导致了米价的跌落。农村的贫困化增强了农民对城市现代产业阵营尤其是财阀的反感，这种反产业主义又与国粹主义结合在一起。传统阵营与现代阵营的这种二重结构，是战前的日本最黑暗的一面，它导致日本走上了法西斯道路。战后通过农地改革才消除了这种二重结构。

中国与日本不同，从袁世凯到蒋介石的中华民国的政治领袖均属于传统阵营中的人，缺乏资本主义式的现代阵营，现代派的知识分子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推翻了这种传统主义的政治模式，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率领传统主义的农民大众迈向了社会主义的产业化道路。然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表明，中国未能避免传统主义的农民道路与现代主义的工业化道路的分歧。周恩来倡导的“四个现代化”政策的最终实行，不得不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重又上台的1978年。现在的中国终于真正走上了产业化与现代化的道路。

如上所述，日本和中国的例子表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的产业化与现代化并非不可能，但却是困难的，主要的困难有两个：一是因自己是非西方社会而产生的文化摩擦，二是因自己是后发展社会而产生的现代阵营与传统阵营这种二重结构。这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便出现了两个阵营间的对立。后发展社会所以发展得晚，就是因为它进行产业化和现代化的条件尚不成熟，后发展社会的产业化与现代化是试图使这个不成熟的社会获得早熟的发展。尽管有些勉强，但却是国际环境在功能上提出的要求，所以这些国家必须实行产业化与现代化。

产业化与现代化不允许德川时代的日本和清朝时代的中国那样的闭关自守，由发达国家所形成的国际环境，不容置辩地把不成熟的后发展国家也卷入产业化与现代化的旋涡中。用系统理论中的系统-环境构架的理论来说，产业化与现代化就是强迫封闭的系统转变为开放的系统。这意味着系统的内部与外部有着很强的相互依赖关系，用系统-环境的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可以说整个世界形成了一个系统。沃伦斯坦的“现代世界系统”，就是这种解释之一。这里重要的是系统的标准问题。在原始社会，整体社会的范围很小，一个亲族组织或者一个小的社会就是整体社会，因此外部没有系统。在现代产业社会，因贸易而发展起来的相互依存的网络已扩大到世界规模，所以系统的范围能够扩展到全世界。不过，当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系统时，环境就已经不包括系统之外的物理环境。因此，世界系统概念与系统-环境构架不能同时成立。

还有人认为，后发展国家所以不得不克服自己的不成熟而走上产业化与现代化的道路，其功能上的必要性在于：后发展国家很容易依附于发达国家，只有这样做才能免除这种危险。任何后发展国家要摆脱这个危险，就必须改变国内的不成熟状态。我上面曾经讲过，要改变这种状态至少会遇到两个困难。如果不是所有国民都直接认识到了本国所面临的功能需要，这些困难就不会得到克服。在这种场合，政治领袖的作用十分重要。不知道人们在将自我参照系统理论引进社会系统理论中时是否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

过去，功能理论和系统理论为以西方社会为对象的现代化理论提供了分析工具，对说明产业化与现代化做出了贡献。上面我们对日本和中国的考察则表明，这些理论对于分析非西方社会的社会变动问题仍然是有用的。日本业已实现了产业化与现代化，中国还处在发展中。功能理论和系统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分析构架，帮助我们研究日本和中国的发展为何会

出现差异、今后中国实现产业化和现代化的条件是什么等问题。社会学的第三代社会学家并没有涉及这些问题，但是在将来的社会学发展的第四个高峰中，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问题恐怕会是个相当重要的课题。我认为，功能理论及社会系统理论应该证明自己能够分析这些问题，只有这样，才会在今后的二十一世纪中获得更大的发展。

作者简介：富永健一，日本东京大学社会学著名教授、中国南开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有社会学理论、社会学史、社会阶层结构、产业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和发展社会学。主要著作有《社会变动的理论》、《产业社会学的动态》、《现代的社会科学家》和《社会学原理》，另外还主编了《经济社会学》和《日本的阶层结构》等书。本文是富永健一为本刊撰写的专稿，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张萍译。

责任编辑：严立贤

(上接第123页)

究内容，即研究大城市的郊区化问题：郊区的新住户居民如何看待新地区，如何定居，对新社区的适应等问题。关于城市化，似田贝认为，工业化并不等于城市化，劳动力的大量集中地也不是城市。他认为作为城市的定义应能概括这六个方面的内容：（1）城市具有中枢管理机能和情报机能的集中，经济的上层建筑方面的职能的集中；（2）城市性分工向极限方向发展；（3）具有多种结构的很大的市场；（4）高速公路交通的中心地；（5）大量的消费和生活方式社会化相结合；（6）存在着中央集权下的管理组织。

费林格在“关于美国婚姻咨询问题”的专题报告中认为，在美国，离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1）爱情消失；（2）婚外性行为；（3）性生活不协调；（4）经济问题；（5）因子女而发生争吵；（6）因赡养双方老人而发生争吵；（7）酗酒、吸毒等。

许多学者都指出：当前我国社会学界在注意联系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社会学应用研究的同时，应加强社会理论的引进与研究，注重社会学理论在应用研究中的指导作用，建立起适合我国实际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使社会学更好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辽 社)